

民族魂——胡秋原

張東寶*

一

前幾天在家整理書籍。一本《胡秋原學術思想研究》突現眼前，頁內有該書主編李敏生先生的簽字：“張東寶先生教正 李敏生 2001 年 5 月”。此乃筆者客居北京期間，獲李先生贈送的(另一本為其撰著的《漢字哲學初探》)。贈書後，李先生還大有深意地對我說：“胡秋原先生是一位歷史偉人！……”我望着這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教授、北京國際漢字研究會副會長，臉上露出了疑問：這位曾被魯迅罵為“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着‘左翼’的招牌”的“自由人”(見魯迅的《論“第三種人”》)竟會是“一位歷史偉人”？李先生見狀，微微一笑說：“看了書，你就知道了”。於是乎，我花了三天的時間，仔細閱讀了這本《胡秋原學術思想研究》¹，看完掩卷之後，不禁敬佩地歎曰：“胡秋原先生，真乃歷史偉人也！真乃民族之魂也！”

胡秋原先生是湖北黃陂人。湖北黃陂，人傑地靈，是宋朝理學家程顥、程頤的出生地。程顥和程頤立志孔孟之道，又泛覽諸家，出入於老釋，是程朱學派的重要奠基者，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1910 年端午節這天，胡秋原生於一戶耕讀之家，其父胡康民是一位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教育家，與中共的董必武曾是同班同學。他對胡秋原的思想和人格之形成有着巨大的影響。胡康民曾自述：“康民少日孤寒為學，及長走奔衣食，歷盡人世艱辛；然無論何時，必矢志自食其力；一念不敢違法，一念不敢負心。自信勤儉立身，仁恕接物，體先聖多能鄙事之訓，先賢儒者治生為急之意，則農工商賈皆謀生之大道；不必事官，始無凍餒之虞。一生節衣縮食，偶事貨殖，亦嘗薄有財產；屢次隨緣蕩盡，亦每苦盡甘來。又嘗思歷代祖宗，無不以利物濟人為懷。為人不可依人而活，亦不

可為自了漢。一生雖於國家未能盡志業於百一，然除於故鄉公益事業外，於老百姓之緩急無告，隨緣盡力；於鄉村坍塌崩道，時加修復；至每年暑季，必購辦大量中西藥品，分發鄉鄰；十數年間，無或中斷。此凡我後裔，永宜遵守之家法也。”胡康民所述永宜遵守之家法，是他的為人之道。他以自己一生的忠厚、樸實、憂國、為民的經歷為胡秋原樹立了人生的榜樣。胡秋原的人格正是他的品格的發展和延長。

胡康民於 1916 年就職湖北黃陂縣教育會長和勸學所長之後，為地方教育事業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增設公私立初級小學六百餘所，高等小學十餘所。他還改良了私塾教學，設立了圖書館以及簡易的科學實驗館等。胡康民為發展黃陂教育，在黃陂建立了第一所中學。胡康民為紀念二程，取了程顥的詩句中描寫黃陂景色時用過的詞“前川”定為學校校名。程顥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流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前川中學於民國十年春正式開學，胡秋原成為前川中學第一班的學生。胡秋原天資聰明、博學強記，在全班同學中年紀最小，但考試成績卻名列第一。胡秋原由於應付功課很容易，他利用課外時間博覽群書，為其以後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前川中學的教職員也都是愛國的有志之士，他們向學生傳播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想，組織學生散發反對日本提出的 21 條之無理要求的傳單，並利用星期日到大街小巷去講演。胡秋原積極參加了這些活動，接受了生動、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在他少年的心靈中樹立了立志不做亡國奴，為國盡力的遠大志向。從此他學習更加自覺和勤奮刻苦。

胡康民一方面鼓勵和支持胡秋原發憤讀書，另一方面也教育他不脫離勞動，不脫離貧苦的勞動群眾。一到假期，胡康民便安排胡秋原回農村參加農業勞

* 福建省老子研究會顧問

動。他在農村瞭解到佃農的貧苦生活，並對那些勤勞忠厚的農民產生了深摯的同情。

胡秋原在學業上突飛猛進，求知欲望越來越強，他閱讀父親的藏書，借閱老師的圖書甚至郵寄自上海之借書還滿足不了他的要求。胡康民除了給予兒子買書的自由外，還親自到漢口為兒子買書。胡康民着意在學術上培養兒子成材，為了支持兒子求學，寧可節衣縮食，向親友借貸，克服經濟上的困難，也盡力供給胡秋原學習上的需要。

在胡康民的身上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的文化和道德傳統。胡秋原始終非常敬重他的父親。胡秋原提倡的人格、民族、學問三大尊嚴，提倡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主張也都體現在胡康民先生的人生上。胡秋原繼承和發揚了他父親胡康民先生作為一個愛國的高尚的知識分子的美德，這是他堅持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之重要的認識和實踐的根源。

二

作為民族主義者的胡秋原先生，他的前半生是抗日的一生。胡秋原成長於五四以後中國民族運動之潮流中，他原預備研究自然科學，雖然其對文史亦有興趣。在梁啟超鼓吹下，看宋明諸儒之書，而對當時在中國流行的尼采思想也有興趣。1925年進武昌大學，仍習數理化。1927年轉入中國文學系，研究文學。但政局一再動盪，翌年初，不得不去上海，入復旦大學，仍修文學。不久，濟南慘案發生，年僅19歲的他寫《日本侵略下之滿蒙》一書，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自此“自由”與“民族”兩觀念為他畢生所堅持的兩大原則。主張文藝自由、思想自由，維護自由主義；反日、反帝國主義，維護民族利益。接着胡氏又寫了《各國民族運動史》、《帝國主義與殖民政策》兩本關於帝國主義殖民政策與世界民族運動的書，並以此兩書稿費於1929年初赴日學日文。繼而考入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部，並取得國內公費。除應付功課外，他仍以研究“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及馬克思主義為主，並由此看西方文藝作品、邏輯、方法論、歷史哲學、考古學、人類學、文化社會學等日文譯本。到1931年，他完成《唯物史觀藝術論——普列漢諾夫之研究》，並譯《藝術社會學》及《社會思想史》兩書。

1927-1928年間，胡氏在思想上除受明末諸儒影響外，對尼采及馬克思最有興趣。在不安不平與危險中，尼采“強者”觀念對振作志氣甚有作用，但在《藝

術論》寫作中，胡氏比較各家思想，發現法國居友的人道愛實在更強，尼采反而顯得虛驕，於是對尼采興趣大減，但對馬氏仍有好感。不過，從未忽略自由與民族兩大原則。在此時期，他由普列漢諾夫和文藝史的研究，在思想上獲得的立場是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惟從未重視階級鬥爭說及階級專政論。即在方法論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在價值論上是自由主義的，將二者予以結合。就此“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而言，胡秋原應是本世紀最早的“新馬克思主義”論者。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戰爭，胡氏激於民族義憤，放棄去日本繼續求學，並創辦《文化評論》，主張抵抗日本侵略。“一二八”淞滬戰事起，胡秋原呼籲，現在不是甚麼黨派或階級問題，而是全民族的自由平等或亡國滅種的問題，所以一切中國人，不分黨派階級或種族，形成抗日聯合戰線抗日到底！他的呼籲，理由充分，故獲得注重，並由他為上海知識界起草《反對日本進攻上海宣言》。宣言末尾有“全國民眾武裝起來，一致抗日！”“反對一切對日妥協及不抵抗主義”等口號。1933年，胡氏參加社會史論戰，撰寫了《中國社會文化史草書》等，主張中國要工業化及民主化，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以抵抗日本侵略。1932年“一二八”淞滬事變後，蔣介石把在上海奮起抗戰的十九路軍，調到福建反共前線，投入內戰；十九路軍廣大官兵不願“剿共”，而願與紅軍合作抗日，於是十九路軍的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聯合國民黨內的李濟深等，於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成立了抗日反蔣的人民革命政府。積極主張抗日的胡秋原，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文化宣傳部主任。

1934-1935年，“福建事變”失敗後，胡氏游歐洲期間應“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之邀赴蘇俄，與中共代表團的王明等相見。王明說，共產國際已改變政策，今後要集中力量反法西斯。王明還說起十九路軍在“一二八”戰爭中的功勞，而我們的黨卻對“一二八”戰爭既未支援，後來又對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坐視不救，這是全民族和我們黨的失敗。他說既要講統一戰線，就必須放棄黨八股的調子。胡氏見王明的態度誠懇，便答應留在莫斯科。自此胡氏在蘇俄留住一年半，為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全民月刊》寫抗日的文章。胡氏也借此機會研究蘇俄歷史及馬克思主義在蘇俄之實行。胡氏曾說，影響他一生學問志業最大的，一是“九一八”日本侵華，二是歐洲與蘇俄之行。他發現革命後的蘇俄，既無自由，亦無平等。當時一面宣傳斯大林憲法，一面進行肅反大清洗。從

1935年的“季諾維也夫叛國案”到1937年的“布哈林叛國案”，幾乎所有列寧時代的老布爾什維克皆以叛國罪被處死。這一幕使胡氏大為震驚。因為對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知識界來說，布哈林是位頗負盛名的左派理論家，不少人從他的《共產主義ABC》中第一次接觸到馬克思與共產主義，所以布哈林在中國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心中，有一定的地位。更令胡秋原難以相信的是，這樣一位左翼理論家，竟在審判時嚇得發抖，拼命作自我否定，自承罪狀求免一死。胡秋原認為，就算是在中國帝王時代，知識分子也受當權者相當優容，在遭受政治壓力時，仍敢挺身而出，為維護真理而不計個人安危，將一切交給後世作歷史裁判。而位居蘇聯首席理論家地位的布哈林，居然未受斯大林起碼的尊重，而布哈林在遭到整肅時，竟拼命自辱求饒。胡秋原震驚到無法接受。他想，這一幕如果將來在中國重演，那將是中國知識界的浩劫。胡秋原還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感到非常噁心。於是，懷着不安的心，他告別了莫斯科，乃至掛着“馬克思主義”招牌的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1951年，胡氏撰著了《俄帝必亡論》，1952年撰著了《俄帝侵華史綱》、《由俄羅斯虛無主義到共產主義》)。不幸的是，胡秋原所恐懼的一幕，最後還是在中國重演，那就是大陸的十年“文革”浩劫。

胡秋原在台灣得知他當年在上海與重慶的一些文壇老友遭難時，感到十分悲痛。他認為中國人不該承受這種由自己所造成的災難。當時他在台灣，經常和友人與學生討論這方面的問題，談到他當年在莫斯科看到蘇共法庭審判季諾維也夫和布哈林等人的情形，談梁漱溟、老舍、吳晗、每每不勝唏噓。這情景，正如蘇東坡所形容的那樣：“今宵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

2010年5月7日，俄羅斯《消息報》報道，梅德韋傑夫總統說：“斯大林對自己的人民犯下眾多罪行……雖然他做了很多工作，雖然在他的領導下，國家取得了諸多成功，但他對本國人民的所作所為不可饒恕”；“是人民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而不是斯大林”。在蘇俄期間，最刺傷胡氏民族情感的有兩件事：一是他在紅軍博物館中看見外蒙古被劃入俄國版圖之內；二是斯大林曾為中國東北的中東路與中國作戰，後又不經中國同意，出賣中東路給日本。1936年，胡氏離開蘇俄回到倫敦，參加“世界和平(反侵略)運動大會”，並在巴黎促成“全歐華僑抗日聯合會”。胡氏抱病在三天內用英文寫好一萬字的《中國與和平》小冊子，又花兩天時間編好日軍暴行與中國抗戰的畫

冊——《中國為和平而戰》。在參加“世界和平(反侵略)運動大會”討論宣言時，胡氏發言說，現在日本業已深入華北，不斷成立漢奸政權，日本人並不相信蔣介石，此時我們主張舉國抗戰，可說是促蔣抗戰，也可說是擁蔣抗戰。畢竟日本帝國主義是主要死敵，多用一分力量對蔣，就是增加日本一分力量侵華。當“西安事變”的消息傳開後，胡氏聞訊大驚，他認為日本正要大舉進攻，如果蔣氏沒了，中國不僅群龍無首，而且擁蔣、反蔣兩派要大戰，則中國危矣。胡氏還認為，“西安事變”是人民抗日要求與南京退讓政策之衝突的結果，是福建事變、兩廣事變之繼續。而斯大林致電宋美齡，說蔣氏如改變政策實為領導中國抗日之唯一人物云云，是通知中共要瞭解蘇俄的意圖，致力於“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1936年12月19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西安事變”討論會，演講者有三個美國人，三個中國人——林語堂、陶行知、胡秋原。林語堂說，此事由對日問題而起，他預測，以中國人的智慧，此事必以喜劇收場，而且張學良可能與蔣氏一同回到南京。陶行知表示，他希望事件能和平結束。胡氏則指出，“西安事變”是“九一八”以來對日政策危機之高潮。有人主張應先求國內統一，才能對外。但主張中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的人越來越多，這就發生了“西安事變”。日本希望中國內戰，以便侵略。中國人民的意願當然與日本相反。他相信而且也希望，美國政府與人民一定會支持中國人民的意願，反對日本。胡氏還在“中國人民之友社”舉行的一個演講會上指出，英美言論以為日本在華侵略乃是對蘇俄作戰之準備，因此美國國會正在討論中立法案。然而，“九一八”以來，日本的戰火由滿洲擴大到華北，日本如果目的在進攻蘇俄，為甚麼不北進而南下呢？其實，日本之目的是要控制太平洋，目標則是美國。美國想要保持中立，未免一廂情願了。他的演講使全場震動，並獲得如雷掌聲。1937年，盧溝橋炮聲一響，胡氏便從美國啟程回國，參加抗戰，並整理寫成“抗戰建國芻議”送交最高統帥部參考。他認為，如要以持久戰求最後勝利，就必須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加速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的建設，才有支持長期作戰的力量，這也是將來建國事業的基礎。與此同時，胡氏在漢口創辦《時代日報》，主張“鞏固統一，抗戰到底，法治科工，富國強兵”十六字民族主義綱領。他還在《中國革命根本問題》中指出，中國革命歸結於抗戰。中國革命目的是建國，建一民主、富強、維護世界和平之國，但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其滅華的政策，所以革命建國必須抗

戰。我方必以長期戰取勝。敵人雖強，弱點亦多，我地廣人眾，非敵人所能征服，且可以長期作戰，中國問題乃是世界問題，其他列強決不願日本獨佔中國，但願看到中日相戰，他們便可從容擴軍，到了一定程度，他們就要懲治日帝，或者日帝也會鋌而走險，這是長期抗戰必勝的理由。1938年，胡氏在重慶出版《祖國》月刊，並發表《中國文化復興論》一文，旨在發揚民族主義。1939年，胡氏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他呼籲，消除一切崇洋媚外的習性，確立民族自尊、自信的意志與信念，瞭解中國應有的立國之道。就在這一年，一向標榜反帝和反法西斯的蘇俄，竟與希特勒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並與德國瓜分波蘭。繼而德國的閃電戰所向無敵，1940年，巴黎陷落、英軍敗退、倫敦在德國的轟炸之下，德、意、日成立三國軍事同盟。當時，中國外交之主流是親英美的。但歐戰後的形勢令中國吃驚，故有孫科、白崇禧、孔祥熙等人的改變外交路線之說，也即親德之意。此時胡氏主持國民外交協會的《外交季刊》，他在國民外交協會講“歐戰論”時，預言德國雖一時得勝，但終必失敗。英國很難登陸，德國與蘇俄的關係很難維持下去，美國尚未參戰，所以希特勒的勝利都是空的，而他的殘忍和種族主義，必在其佔領區內引起反抗。此時的蔣介石主張以不變應萬變，但一般人不能接受。於是，胡氏代重慶行營主任張群寫了一文，其中有四個要點：維護公理正義之立場不變，維護國家獨立統一的立場不變，維護九國公約之立場不變，維護國際集體安全之立場不變。1940年，胡氏任國民參政員(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也是參政員)，出版《歷史哲學概論》。針對戰時重慶的生活日艱，國民黨以統制經濟為名，力行管制，結果官商勾結，奸商囤積居奇，胡氏寫《民生主義是資本主義》一文，主張放棄統制政策，獎勵生產，卻引來汪精衛的痛罵。陳獨秀寫公開信致國民黨，說胡氏的話值得大家研究，不可加以壓迫。過不多久，汪精衛就逃往越南河內投敵了。1942年，應董必武之請，胡氏設法營救出關在上饒集中營的馮雪峰。周恩來曾在一封給李先念等人的電報中稱：“胡秋原先生是我黨現階段統戰的著名人士之一”。胡氏曾多次與稱他為“秋原兄”的周恩來交談，就民主政治和軍隊國家化交換過意見。周恩來還請胡氏對中共提實貴意見，胡氏也直言不諱地一吐為快。故而彼此雙方建立了互信的基礎。² 1941年，蘇俄與日本訂立中立條約，斯大林在送別日本外相松岡時擁抱對方，並說“我們都是亞洲人”，引起中國人普遍的反感。胡氏在《祖國》刊物上發表《殺關東軍！》一文，說

日蘇中立條約不過供日本多派幾師兵來中國，而兩年零九個月，我們中國已殺了一百幾十萬日軍，即令將二十萬關東軍統統調來，也應鼓勵我們更奮勇殺敵。就在希特勒大舉侵蘇、蘇軍兵敗如山倒之時，胡氏仍主張盡力援助蘇俄，並寫了《反軸心國家應全面合作》，充分顯示了我泱泱大國的風度。七個多月後，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胡氏預料日本必南進攻美之語又言中了。

1943年，胡氏任《中央日報》副總主筆，出版了《我們的祖國》、《民族文學論》、《近百年來中外關係》、《中西文化與文化復興》等。1945年，胡氏創辦《民主政治》月刊，主張民主與統一。《民主政治》出版後，非常暢銷，影響很大。同年胡氏當選國民黨第6屆候補中央委員(國民黨元老葉楚傖介紹胡氏加入國民黨時，胡氏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表示，他相信國高於黨，如果黨與國的利益發生衝突，他只承認國家利益，不受制於黨)。因反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犧牲外蒙古及東北權益，被“免本兼各職”。在這之前，胡氏曾寫了一份說帖，內引左宗棠的話“保新疆可以衛蒙古，保蒙古可以衛京師”。喪失外蒙，華北不保，不僅八年血戰之功廢於一旦，而且後患無窮。他將這說帖，一致蔣介石，二致宋子文，三致新任外長王世傑。鑒於事急，胡氏又印好兩百多份傳單，題為“參政員胡秋原對中蘇談判之聲明”，分途寄參政會元老和各界領袖人物，又寫一信給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批評美國不應參助該條約之成立。胡氏認為，中蘇條約之害，實不下於21條，而全國竟無反對之聲，是眼前利害蒙蔽了長久利害。他在《中國需要一個精神革命》一文中指出，要反對民族虛無主義，反對崇洋媚外及蔑視人格、民族、理性之尊嚴。1945年10月22日，外蒙古經“公民投票”宣佈獨立，而在東北，俄軍肆其暴行外，還將日本在東北的工業設備及所有黃金作為戰利品，運回蘇俄，價值約五十億美元以上。至此，許多人才對胡氏為甚麼反對中蘇條約讚歎其有遠見卓識了。1989年鄧小平在與來訪的戈爾巴喬夫談話時嚴肅指出：蘇聯“十月革命”後也還有侵害中國的事例。“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勝利時，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簽訂秘密協定，劃分勢力範圍，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時期。當時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同蘇聯簽訂了條約，承認了雅爾塔的安排。”總之，抗戰時期，胡秋原寫文章最多，這為新聞界所共知。

三

1950年底，胡秋原舉家從香港遷往台灣，在父親病故後的居喪期間，完成了《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這一大著。在國民黨的系譜中，胡氏無派無系，一直以他獨特的智慧、真摯無邪和懾人的尊嚴，傲然獨立於詭危陰暗的環境。正是這樣一個手無寸鐵，政治上毫無依靠的人，無畏的發表了1977年9月《也談“鄉土”與“人性”之類》和1978年《中國人立場的復歸》。在那危急的時刻，掀開了他的襟袖，遮掩了官府所要追捕的書生，挽救了台灣當代文學。胡秋原在台創辦《中華雜誌》時，“五四”時樹立起“重新評估一切價值”之旗的西化派首領胡適，一以貫之地積極傳播西方文明，這幾乎是他學術活動的主要部分。在其及殷海光、雷震等西化派人物的影響下³，“憤世嫉俗”的李敖在《文星》雜誌發表了“老年人與棒子”一文，說是要杵一杵老頑固的駝背，讓他們皺一皺白眉，高一高血壓。⁴此文謾罵古今學者數十人之多，而李敖也因此文在台灣文化界暴享盛名。李敖還在《播種者胡適》的文章中，稱讚胡適是永不停止地追求真理的“國中第一人”。然而，胡適於1961年11月6日，在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於台北主辦的“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的英文演講中，說放棄東方比西方更多“精神文明”的自傲，承認東方文明所吟頌的精神成分實在很少，東方各古老的文明屬於年老身衰、心智頹唐的時代，是一種不能利用人的智慧來征服自然以改進人類生活條件的文明，因此必須丟掉東方人可以憑藉優越的精神文明的自傲，明白承認近代科學和技術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確是最神聖的因素的累積成就云云。他還說，這是他“35年前的老話”。他的“老話”確實不少，諸如“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道德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等等，這次演講自然引起了軒然大波，儘管有人說，這是胡適的“最後輝煌”。但學術界則有人指責胡適重彈“全盤西化”之老調，新儒家運動發起者之一的徐復觀則憤然寫下了《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直斥胡適“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科學，不懂佛學，腹中太空”。針對李敖的《播種者胡適》，葉青和鄭學稼著文予以否定，說胡適侮蔑中國傳統文化，是徹頭徹尾的“文化買辦在洋大人面前討好的表現”。而《中華雜誌》、《民主評論》、《自立晚報》等報刊指出，胡適過去將中國傳統文化批評得不值一文，在“民主”與“科學”的幌子下鼓吹“全盤西化”，實際上已幫助了馬克思主

義在中國的傳播云云。胡適與徐復觀發生的“中西文化”之辯，胡秋原本無意捲入其中，但《文星》雜誌再三邀請撰文，胡秋原只好從命寫下了《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的傳世佳作。公平地說，1960年西化派的雷震案發生後，台灣也只有胡秋原與成舍我仗義執言過。此事發生後，因人心不安，胡秋原應《民族晚報》之請，寫了30萬字左右的長信，並使該報銷路大增，後印成書，題曰《同舟共濟》，亦暢銷一時，書中有一句話說到美國學術，“長處在科技及企業管理，而史學與哲學很難令人恭維”，這引起當時奉邏輯實證論為聖經的新西化派及希望台灣加強內鬥的台獨分子及其國外支持者的憤恨。無用諱言，胡秋原創辦《中華雜誌》，就是為了對抗西化派。因為當年南京以汪精衛為首的高等華人“低調俱樂部”就以西化派人士為多。胡氏認為，由於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不可分，所以必須研究國際問題。而國際形勢是歷史的橫斷面，歷史的縱與橫研究，均必須對西方、蘇俄、中國的文化史作比較研究，而這又是研究學問方法論、價值判斷論的問題。為了保持研究之正確並有利於國家，他提倡知識分子務須維護人格尊嚴、學問尊嚴、民族尊嚴，以及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超越傳統。而“一切學問，都為了我民族之生存與進步”，他的全部著作和學問，即在“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生”。胡秋原認為，世界各國學者為學，無不首先考慮其本國利益。他們有用學問損害外國，如曲解或破壞他國歷史文化，但絕無剽竊、販賣、模仿外人之說而自炫於本國，或危害本國。但在中國，竟有此種學奸。胡氏痛心於此，故提倡三尊嚴與三超越及民族主義。

自1960年起，台灣時有反民族主義之聲浪，胡秋原曾寫專文多篇回應。孫中山先生曾有一句名言：“民族主義是國家圖發達和中國民族圖生存的寶貝”。胡秋原對民族主義亦有精闢獨到的解釋：“民族主義同時是民主主義”，“民族主義就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不是甚麼了不得的道理，但是立國的第一個基本道理。今天沒有一個國家不講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不是孤立主義”；“沒有學問，民族主義是空虛；沒有民族主義，學問是盲目；二者都不講，不僅不成其為中國人，也很難謂之為人。而違反中國人利益，那絕對不是學問”。胡秋原認為，中西文化均基於、也趨向於人文主義與理性精神，而且此二者在中國比西方發展得更早更充分。中國的“鑒往知來”、重視傳統及歷史的觀念極好，“治亂興衰”、“因革損益”等觀念亦有極大價值。明清以來，八股、太監、閉關

三者使中國文化創造力停滯，但同時，西方人則向外航海求知，兩個相反的發展，才造成 19 世紀雙方國力之懸殊，而有鴉片戰爭以來的積敗。在積敗中不研究文化興衰之故，作正當的因革損益，復興其創造力，但循積衰之勢，枝枝節節，模仿他人，模仿就是不忠於自己，不忠於學問。於是不能學人之長(獨立精神、研究學問)，只能學人之短(勢利主義、自私貪婪)。西化學得不成樣子，乃又求救於俄化，此所以先人忠厚剛正之氣日趨於喪失；略知西人俄人之言者只以此自炫於國人，而對外國人，又只有低首下心。由於我們沒有堅實的近代民族國家之基礎，沒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加上地方主義壓倒民族主義，個人之恩怨，黨派之鬥爭，家族與幫口朋友之利害，每易超過對國家民族的關心。胡秋原認為，台灣的反民族主義可分兩大股。一是崇洋媚外的西化派，他們的思想與生活兩方面均已殖民地化、外國化、美國化，喪失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患上軟骨症，不能抬頭挺胸做中國人，賣身投靠，乞求洋人憐憫，不惜走向反中華、反民族主義的邪路。另一股反民族主義的是“皇民化”或日本化的“台獨”分子，他們數典忘祖，認賊作父，否定自己是中國人，自稱是“台灣民族”，主張“台灣民族主義”，要分裂中國、脫離中國，另建“新而獨立的國家”。這兩股反中國、反民族主義的勢力叫出反民族主義的怪聲，像老鼠的叫聲一樣，所以胡秋原稱他們為“老鼠”。反民族主義的台獨分子，則攻擊胡秋原是“中國沙文主義者”，“大漢沙文主義者”，有“破壞台灣人自我認同的陰謀”，因民族主義使台獨運動難於發展，便主張台灣與日本合作共榮，希望美國保護台灣人的利益。反民族主義的西化派，則說民族主義可能嚇走美、日諸“友邦”來台投資；可能引起八國聯軍；說主張民族主義者是義和團；又說民族主義已經過時。台灣的西化派還說，民族主義有限度，它將使我們缺乏世界眼光，不能做客觀的認知，並且阻礙社會進步等。有一位西化派的台灣中研院院士在香港演講，說明末諸儒反清復明是多事，辛亥革命亦大可不必。大陸一位西化派人士則說，中國必須淪為外國殖民地 300 年後，才有希望振興。還說，他不怕別人罵他是漢奸賣國賊，因為馬克思說過，“工人無祖國”，他沒有祖國，哪來出賣背叛云云(胡氏認為，有着猶太人血統的馬克思之所以說“工人無祖國”，乃是因為猶太人二千多年以來無國可居，到處流浪)。以上各派反民族主義的怪聲，胡秋原認為都沒有一句是站得住腳的，乃一一予以駁斥。胡秋原認為，在今日台灣之所以特別需要民族主義，

就是新聞界、出版界乃至產業界有一種漢奸主義，這種漢奸主義猖狂到稱漢奸為忠烈，瘋狂到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以重新回到殖民地為“民族獨立”。這種漢奸主義用西化來掩飾，不以崇洋媚外為恥。對此“東化”，“西化”之毒，民族主義是必需的抗毒素。面對未來建國大業，民族主義亦為必需。我國承明朝專制及滿人部落專制之後，繼之以百餘年洋場殖民主義之毒，民族尊嚴橫遭破壞。民族尊嚴既破，即不知何謂個人尊嚴。民國以來，一切軍閥、官僚、政客、學棍，一切漢奸、強盜、騙子、流氓，無不是殖民主義病毒進入骨髓以後產生的畸形兒。所以我們需要民族主義來澄清血毒，將長期積毒和併發毒所產生的離奇卑賤的痼疾自拔出來，而恢復正常尊嚴；發揮民族自尊自立和同胞之愛，重建國家。今天沒有一個國家不講民族主義。無論內政外交，開口總是國民利益，這就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不是孤立主義。他的最後目標是要發揮和解放中國人的文化創造力，使中國人對世界文明有所貢獻。每一個民族都認為自己的民族文化歷史最優越，自己的民族利益優先，都根據自己的民族立場判斷一切，於是產生價值相對主義。價值既無絕對性，大家就說不要討論價值，於是強權主義、帝國主義及獨裁主義流行，強權即公理，因無善惡標準可言。在學問上民族主義如和價值判斷發生矛盾，應如何解決？儒家主張“推愛”，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近及遠，由親到疏，漸次推展。應用此道理，亦可解決民族主義及價值判斷之矛盾。先愛本國人，再愛外國人。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大同之世是理想，只能逐漸實現。中國問題之解決，必須中國人走自己的道路，此即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超越即脫離此三種精神桎梏，依據學問走中國之道路，同時要選擇最好的道路——這是價值判斷問題。史學上價值判斷之最高標準是全人類之和平合作，解放全人類文化創造力並求平衡發展。但是中國人口佔全人類 1/4，不先解決中國問題而空談世界，亦是畫餅充饑。所以我們必須先為中國人之和平團結以進求全人類的和平團結。實現一個獨立統一和平民主的中國，是我們的目的。民族主義是人類歷史的一個總的潮流，尤其是百餘年來中國人的一個總的潮流。不到全世界民族主義充分實現，即各民族皆能獨立，進而自由聯合，世界亦無和平。全世界一切民族之自由平等與合作，可說是歷史的總目標。漢奸國賊是反民族主義的，貪污特權也是反民族主義的。與外國人合作賺中國人的錢叫做買辦，沒有真學問，拿兩

句外國人的話自炫，又不真懂，即自雄於中國青年之前者也是買辦。前者是無知，後者更可恥。民族主義在台灣逐漸消沉，而且公然有人反對民族主義，這是反常，自滅其根。既有人要從根自滅，就必須從根救起。這可以說是《中華雜誌》的宗旨。我們是在比較文化史研究中，中外關係歷史中，馬列共產主義之分析與區別中，建立歷史哲學和史學方法，提出診斷與處方。我們的西化派、俄化派則在外國侵略中，因中國文化之破敗而崇洋媚外。我們提出人格、學問、民族三大尊嚴，分析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失敗過程，主張超越前進，就是從根上挽救卑弱與墮落，掃除依賴心樹立中國人之自信心和主體性，確立自立自強的意志。所謂民族主義者，乃是要在同胞之愛與休戚相關之中，求全民族團結，依自己的需要與條件，走中國人自己之路。我們還有一種民族虛無主義。其舊的標本，就是曲解先人“撫我則後，虐我則仇”的對內之言。現在有許多漢奸，也是以這種思想作辯護。

胡秋原先生為中華民族招魂，論中國立國之正道，感天動地，這才是中華心，民族魂。據2010年4月29日的英國《每日郵報》網站報道，以移民國家著稱的美國為例，多數美國人愛國甚於愛家，這難道不值得深思嗎？胡秋原不僅倡導民族主義，而且提倡討論中國文化之復興。他指出中國民族文化精神，共有七點：①自由平等的精神；②尊重勞動的精神；③正義自尊與堅毅精神；④現世與務實精神；⑤博愛與和平精神；⑥為正義自衛而戰的精神，中國並不主張屈辱的和平。“惜乎自五胡以來，此義漸晦，學鮮卑語者有之，為胡兒者有之，稱兒皇帝孫皇帝，覩顏事仇，媚外陷忠及自稱順民者有之。然我民族之忠義英雄奮鬥事蹟，亦史不絕書。民族精神，賴以不墜”；⑦獨立創造的精神。胡秋原指出，最顯著的是中國文字，自成系統。複音變為單音，文法簡明合理。初學書寫是較困難，但此無礙中國語文為世界上最進步之語文。近人不明此理，崇洋媚外，自棄珍寶，任意簡化，甚至主張羅馬化、拉丁化。晚近中國之落後，由於科技，不在語文。中國語文是中國人應當自豪的偉大創造。

筆者以為，一個真正的歷史偉人，他發出的智慧之言，可以在千百年以後仍能夠指導着我們的社會與科學實踐及生活之指南，無論是東方的老子、孔子、佛陀，還是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是這樣的歷史偉人。而在中國現代史上，胡秋原先生是具有歷史偉人的地位與資格的，他不是跟在時尚潮流後面人云亦云，做一個時尚學者而已，他是力排

眾議並具有遠見卓識的大丈夫(例如他批評“一邊倒”的對蘇俄政策，他說“腐敗是今日大陸經濟之癌”)！有些人的“偉大”是要打上折扣的，即便有人憑着權威硬要貼上那“偉大”二字，也是會在歲月的無情淘汰中掉下來的。想想看吧，近現代以來，有多少著名的學者、作家，在西化或俄化問題上，在傳統文化與漢字問題上陷入迷誤與錯誤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並且因其影響而誤導當時與後來之青年，給我們中華民族造成了極其巨大的傷害！

胡秋原在他的《中國英雄傳》一書中，稱讚從戰國到晚清的154位英雄，其中包括“穿着袈裟，拿着禪杖，越摩天之蔥嶺，飄天際之海洋，不顧死生而求法(真理、學問)者”。“其精誠無畏，無殊英雄；或者，可說是一種聖雄。這便是：法顯與玄奘。”同時他也悲痛地說：“民國以來，軍人很多，但浪費赤血於內戰者也太多。”因此，他反對中華民族的內耗和自相殘殺。在文藝創作方面，他反對極左的狹隘立場。他認為，任何的人和事，只要是有利於挽救民族危亡和推進民族、國家乃至世界的自由，都應當對之寬容。他還在《一百三十年來中國思想史綱》一書中，對中國思想界之異化(西化、俄化)提出批評，而主張復興中國文化，走自己的新的道路。胡秋原透過他的學說，清晰並痛楚的詮釋了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而這部中國近代史則向每一個中國人吶喊着祖國的偉大與不幸，呼籲我們每一個人發憤治療自己心靈的病痛，由此來治療我們全民族的創傷，走向理想的中國。胡秋原對20世紀以來西方與蘇俄之重要的哲學思想及其流派與主要內容的精闢研究，便很有正本清源的參考價值，也就是說，一旦中國人能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深入的瞭解西學與俄學，便自然知道如何取舍，不易發生困擾。而且，如果中國皆能以中國立場為根本，彼此之間即使不免發生歧見，也應該不致惡化到無從溝通、妥協的境地。回顧20世紀歷史，因受外來思潮的影響，無寧是導致中國人在精神上出現分裂的主因之一，其後果則至堪傷痛。胡秋原對此感受尤深，他投下巨大的心血、時間，做出扎實的研究成果並出版專著，這都應該是全體中國人的一項寶貴財富，也說明了，西學與俄學是可以全盤認識和公正比較、深入批判的，而不必造成中國人的自卑與自虐，甚至於自相殘殺。還須指出的是，胡秋原在他所批評的“西化”與“俄化”思潮中尋求振興中華之理，並逐步確立起自己獨立的思想體系，從而在揚棄“西化”與“俄化”思潮之後，實現了對於“西化”與“俄化”思潮的超越。具體來說，這種超越就是在中西文化比較研

究中，在對於中國文化史的深刻反思中，得以實現的。在中西方化比較研究中，他發現了中西文化的共同點；在對於中國文化史的反思中，他發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不僅不是落後的文化，而且在許多方面還優於西方文化。從而使胡秋原在本質上批判了中國文化落後論，或者說批判了把中國落後歸於中國文化落後的論調。這樣就自然地引出了他的復興中國文化的重要結論。也就是說，中國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在根本上，不能靠“西化”與“俄化”，而是要靠復興中國文化來真正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既然中國的事情要靠中國人自己來辦，或者說，中國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不能靠別人，而只能靠中國人自己，那麼，中國人靠中國文化復興來提高自己的素質就是必然的。這一點，確實是中國一切發展的關鍵。正如胡秋原上世紀 30 年代周遊世界時對比中國當時情況所深深感受到的：“以國人之刻苦勤勞，聰明才智，決不遜於西人，不如人者，平均智力不如人，政府之才能不如人耳”。有學者指出，秦漢之後，中國文化與印度、波斯、羅馬等外來文化，曾有過和平、柔緩、悠長的對話與互滲交融的過程，這才結出了印度佛學轉化為中國禪宗及其他各宗之果。然而，近現代的西方文化之來臨，卻是氣勢洶洶，不可一世的，且伴隨着槍炮和一些民族文化的滅絕。由工業革命武裝起來的西方，像一架巨大的技術和意識形態機器橫行而來，向全世界平推過去，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初，西方哲學以征服者的姿態，通過由它訓練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如胡適等)，按照它的現成方法和系統化門類來主宰治理中國文化，包括惡意地否定漢字的優美與先進性，中醫的科學性、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並以“啓蒙”者的口吻告訴中國人，甚麼是理性和科學。更難堪的是，這種文化上的征服還要經先行一步的日本人之手，中國的陳獨秀、魯迅等，就是經日本人手而接觸並薰陶於西方文化的。因此，這種文化和思想上的不平等、不合宜比“不平等條約”要更持久、更微妙，也更令人無可逃避。

胡秋原認為，中國古代的優秀知識分子，具有剛健恢弘之氣，實事求是之誠，由寬厚而生的親和力，由自愛而生的榮譽心。而中國的《易經》有科學，《春秋》有民主，《周禮》有社會主義⁵。儘管如此，胡秋原仍主張要超越傳統，一方面要吸收並尊重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則須克服傳統中的僵化停滯觀點與局限性，也就是說，繼承傳統並非是“全盤的”。而無論是對西化、俄化、傳統的超越，不僅需要勇氣，還須具備淵博的知識與人格修養。

由此可見，胡秋原確實是一位少見的特立獨行，慧眼別具，胸中有浩然正氣，身上有剛強風骨的民族主義者，他的千言萬語、苦心孤詣，很具有傳統中國讀書人立言之特色，亦即心存說服與教育。至於一個人的道德、文章，甚至愛國精神，是否能被他所生活的那個時空環境所欣賞或接受，則往往是另一回事了。正如胡秋原自己所說：“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但他堅信，文字收效之日，即理想實現之時，此所謂立言可以立功也。

1969 年“珍寶島”事件後，胡秋原開始呼籲統一，因為只有統一，才能集中力量建國。大陸“文革”結束後，胡秋原對大陸的改革開放抱有極大的希望。1979 年中越發生戰爭，《中華雜誌》主張援共抗越。從 1981 年起，《中華雜誌》不斷主張實現和平統一及國家再建的百年大計。1988 年，《中華雜誌》與“夏潮聯誼會”、“中華合唱團”及其他各黨派人士成立了“中國統一聯盟”，胡秋原被推為名譽主席。同年 9 月，近 80 高齡的他，從美國赴大陸探親訪友，開始了他的兩岸破冰之旅，受到大陸同胞的熱烈歡迎。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設宴熱情款待胡秋原一行。胡秋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中國不能沒有台灣，沒有台灣就沒有海防；台灣不能沒有大陸，沒有大陸便成了國際孤兒，誰都可以吃你。經過四十年的發展，大陸製造了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說明能強；台灣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說明能富。所以，中國只有儘快統一才能走上富強之路”。9 月 15 日，胡秋原與前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見面時，相隔近半個世紀的重逢，二人都非常興奮。鄧穎超親切地說：“能與你重逢，真是喜出望外！我過去在‘國民參政會’上就久聞你的大名。秋原兄，自從重慶分別以來，數十年不見了，恩來生前很想念你，常常提到你。你是一位愛國主義者，一位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學者。你在學術上很有成就，你寫了那麼多主張團結與統一的文章，這是對我們國家民族的大貢獻。我們這一代終生奮鬥與追求的目標，除了希望國家強盛之外，還有甚麼其他目標呢？”鄧穎超還說：“儘管國共兩黨過去有恩怨，但終究是一家同胞，和平解決中國分裂問題越早越好；我們應當做共同對國家有利、對民族有利的事情。信仰不同不能妨礙國家的統一。秋原兄的看法和今後更多台胞提出的意見我們要考慮，共同商量。我們歡迎各方面的意見，對統一，我們一方獨唱不行。”胡秋原則說：“大陸方面對和平統一已經表現出相當的誠意。蔣經國先生逝世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發了唁電致哀，並希望台灣局勢安定，經濟繁榮，這表現出

很大誠意。我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最重要的是，中國非團結、統一不可。”他的言論，得到台灣張群和陳立夫的支持，卻被李登輝之流開除黨籍，被“台獨”分子叫囂要判處極刑，然而受到廣大台灣愛國同胞的歡迎，形成了“胡秋原旋風”。從1990年起，由於台灣李登輝之流的倒行逆施，致使“台獨”的勢力日益囂張，造成了兩岸統一的阻力。

胡秋原認為，統一的最大阻力來自外國，首先是美國。美國欲獨霸世界，必不許中國統一，必使台灣獨立或讓它以中華民國名義形成獨立，以與大陸相對抗。20世紀60年代初，蔣介石因主張一個中國，引起美國不滿，曾於1961年計劃以陳某取代他，後來計劃失敗，美國轉而支持“台獨”活動。美國人自己親自出馬製造混亂的亦絕非僅有。今天之美國已不像林肯時代那樣尊重中國主權，也違背了它與中共建交時所說的“只有一個中國”、“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今天美國對華政策，要以台灣制大陸，以台獨制國民黨。這與當年日本一樣，以華制華，不許中國統一。除了外國，阻力還來自於“台獨”和“獨台”兩大勢力。“台獨”和“獨台”名異而質同，是以台灣與大陸相脫離並取得國際認同為目標。“台獨”是台灣獨立的簡稱，明確提出要在台灣建立“共和國”，把台灣變成獨立的國家；“獨台”提出要在台灣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稱為“中華民國”。胡秋原把它們做這樣概括：一個要實現“全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一個要使中華民國成為“在台灣之中華民國”。胡秋原指出，“獨台”和“台獨”表面看不相同，而從實質看共同點明白，第一，他們都否認台灣是中國的土地，要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第二，他們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們不知身從何處來；不知台灣之有今日是三四百年來中國人共同經營開發的結果。第三，他們要改變台灣的歷史，台灣賣與外國，使之重新成為外國殖民地，使之成為外國人進攻大陸的基地。這樣，不僅將使中國不能統一建國，而且將使內戰再起甚至漫延為世界大戰，使台灣化為灰燼，他們利令智昏，還自詡是為了“台灣二千萬人的福祉”。這是一切中國人都不能容許的。“台獨”和“獨台”都是一些數典忘祖、妄自菲薄的炎黃不肖子孫。“台獨”一出現就為全國人民所共責，其失敗下場早可預料。而“獨台”呢？不易一下子被識破，因為它使用“中華民國”旗號，還一再聲稱要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欺騙許多善良的人，就因此，它比“台獨”就更加危險。1992年7月，83歲高齡的胡秋原先到香

港，參加“兩岸和平統一討論會”，繼而赴北京訪問，與各界討論統一的問題。後因患病提前回台。1995年4月23日，他參加中國統一聯盟第八屆盟員大會，以名譽主席身份發表演講時提到：“最近大陸負責人江澤民先生提出中國統一問題八點意見，我以為最重要的一點是發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我想大陸能夠如此，必能掃除俄化主義之殘餘，而台灣尤當認識祖宗的真面目。”“喚起青年的民族自尊心，並以發揚此優秀傳統為己任。我想這才能消除李潔明的毒，吳三桂的毒和司馬遼太郎的毒，實現和平統一的真正醒獅的中國。”早在1971年，當美國將中國的釣魚台交給日本的消息傳開後，留學美國的學生們立刻發起保釣運動，台灣學生也群起響應。《中華雜誌》極力聲援保釣運動。胡秋原親自撰寫社論說：“這是一個純粹而偉大的愛國運動。”“他們所表示的是一件事情：釣魚台是中國領土，抗議日本的野心，忠告美國不可袒日，希望政府採取堅定公正的立場，並希望國內父老兄弟瞭解他們的立場，一致保護釣魚台。”“中國人民永遠是中國人民，除非中國民族在地球上消失，不會答應日本人拿去釣魚台的。”在台大舉行的“釣魚台問題座談會”上，胡秋原發言說：“保護釣魚台運動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要收回釣魚台，而且要使釣魚台問題解決後，永無同類問題繼起，不再有人侵擾中國的領土主權。”周恩來曾說：“保釣運動是海外的五四運動。”

李敏生先生曾充滿敬意地說過：“胡秋原先生是走在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前列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他在這一偉大事業中建樹的功績已經載入史冊。”1989年，由於在大陸、台灣、香港乃至世界，刮起了陣陣“胡秋原旋風”，美國傳記學會便將胡秋原列入《國際著名領袖人名錄》。

胡秋原生前在寫給李敏生的信中說：“現要與先生談一事，並有煩先生者。弟大概總還有五、六年的壽命。我只想寫三篇短文。有許多朋友希望我寫一簡單年譜，但此事恐須兩三年之力。弟以為胡傳⁶雖雜，仍有史料。我預備編一簡單年表，且已有資料，至多一個月可了。其次，我曾寫《一百三十年中國思想史綱》，至一九七一年止。現在又過了廿多年，中國有大進步，我準備加一章，除論後期文革外，要對改革開放以來之良好趨勢加以讚揚。恐須三、四月乃至半年。三是對先生所說之《冤案》⁷加以介紹。此外，弟將對中古中國文化寫多少是少，先將唐代寫好。如天假以年再寫宋代以後。”

季羨林先生曾在為《中華心》一書題詞中指出：

“胡秋原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中國學者之一，他努力促成祖國海峽兩岸的統一，批判台獨分裂祖國的謬論；他竭盡全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他為中華人民立了功，特志數語，以表高山仰止之忱。”季先生的話代表了大陸廣大學者的心聲。胡秋原是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具有獨特風格並佔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

正因為胡秋原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歷史地位，1995年8月，在李敏生先生的積極籌劃下，

在北京民革中央召開了兩岸學人參加的“胡秋原學術思想研討會”，著名科學家錢偉長題字為賀——“弘揚祖國傳統文化，促進兩岸和平統一”。民革中央名譽副主席賈亦斌在講話中，稱胡秋原是“著名的學者”，說自己“素以良師益友事之，既敬其人，又愛其文”。而筆者所要說的是：有一顆“中華心”的胡秋原先生，是當之無愧的民族魂！

註釋：

- ¹ 李敏生：《胡秋原學術思想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
- ² 《胡秋原與周恩來、鄧穎超交往始末》，載於《書屋》，第8期，2008年。
- ³ 據台灣作家陳映真回憶，上世紀60年代初，好學深思的台灣青年很注意《文星》雜誌為中心的西化派言論。
- ⁴ 李敖：《傳統下的獨白》，香港：香港文藝書屋，1973年。
- ⁵ 按照台灣作家李敖的說法，《禮記》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等等，是最早期的、最理想化的共產主義。“不必藏於己”，代表各取所需；“不必為己”，代表各盡所能。能夠各取所需，能夠各盡所能，這個時候的人格是最完美的，是聖人的境界。
- ⁶ 張漱菡：《胡秋原傳——直心巨筆一書生》，台北：台灣皇冠出版社，1988年。
- ⁷ 李敏生、李濤：《昭雪漢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漢字科學體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